

RED STAR OVER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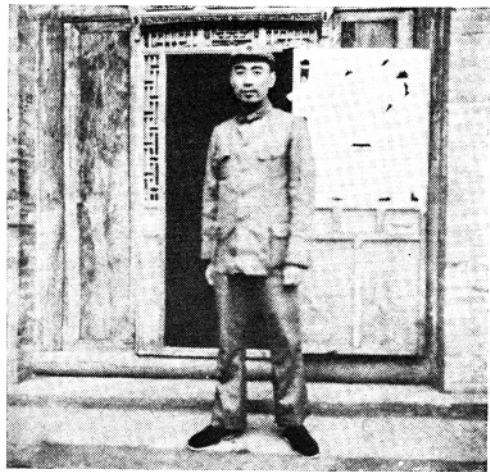
Edgar
Snow

斯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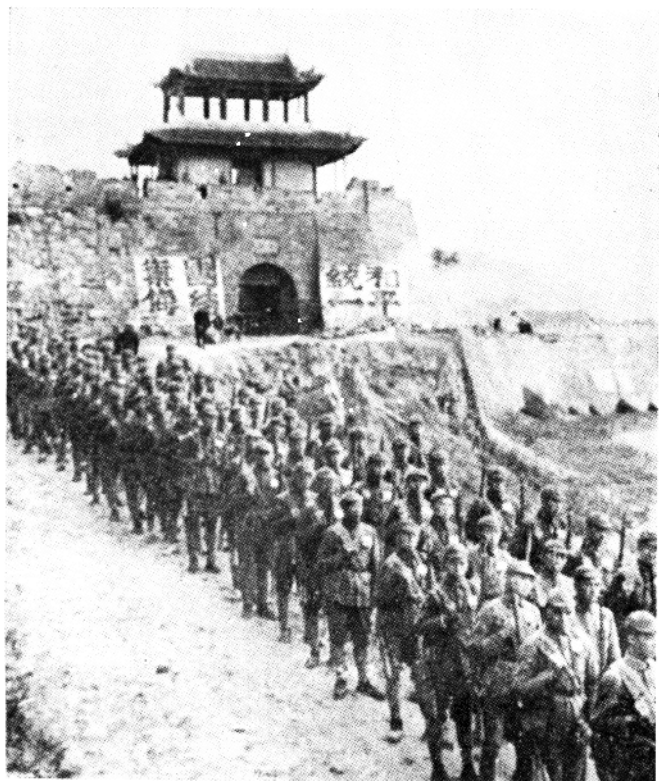
西行漫記

(上)

陳雲翹譯·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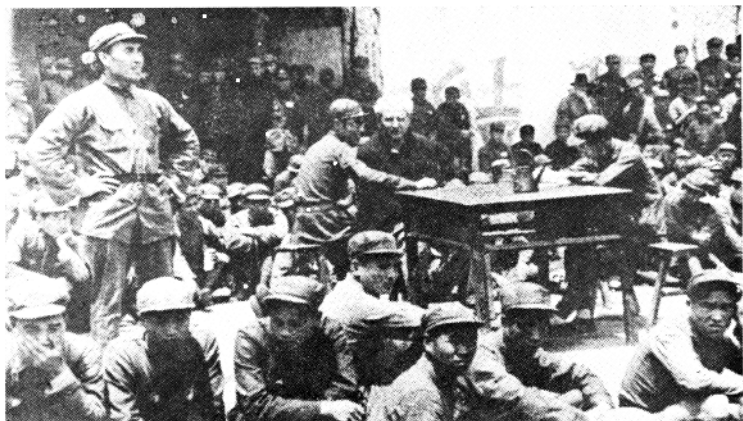
周恩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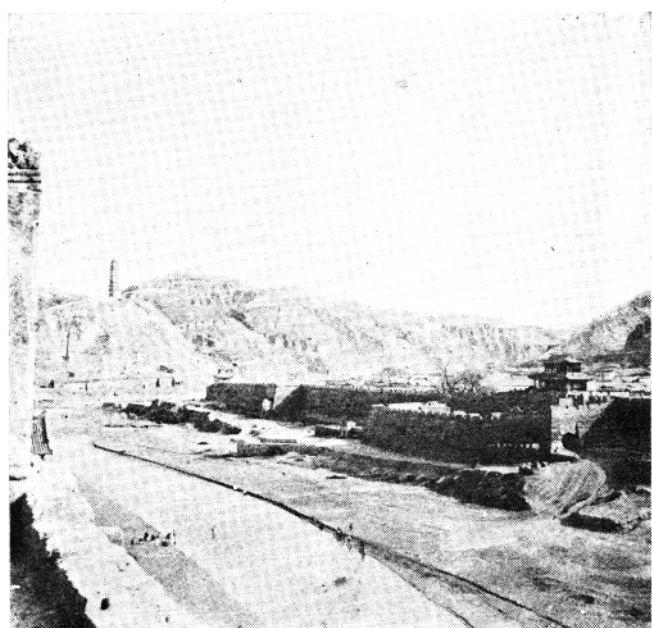
延安城門



毛澤東和朱德



朱德主持一個大會



延安一角



練兵場上



延安抗大

延安的一支部隊



一九四四年版作者序

我寫成這部書，已經過去七年時間了，而在歷史上，沒有哪七年發生了像過去七年那樣重大的事件，也沒有哪七年像過去七年那樣大大地擴大了為爭取人類解放而鬥爭的領域。當《現代叢書》的出版者最初建議我修訂本書原文並把它續寫到今天時，我覺得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然而，當我再次仔細地把本書閱讀一遍以後，我就認定全面改寫本書的企圖是不實際的了，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自一九三七年以來，儘管發生了席捲中國和全世界的大災難，但是，這部書所記錄下的材料，因在歷史上已失時效而應予刪除的，少而又少。使人感到驚奇的事情是，本書的許許多多根本事實、解釋和觀察，依然精確地展示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源泉，依然精確地展示了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當性。不可思議的事實是，哪怕是今天，也沒有誰能夠說本書裏寫的男女為之而戰鬥的生活樣式，最終不可能在全中國盛行，本書中寫的男女，其中許多已經爲了這種生活樣式而犧牲了。

第二，《西行漫記》所涉及的歷史時期，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爲清楚，碰巧具有這樣的一種轉機性質，因此毫無疑問，它起碼使未來一個世代的中國命運具體化，這更多

地是出於偶然，較少地出於立意如此。試圖把比較近期所發生的事件的無關事實，編進一個特定時期的記事及其語氣裏去，會使原書所具有的完整性喪失。同時，對於兩個歷史時期的相互關係，人們得到的必然是一個不完全的概念，一個多少是混亂的概念。

因此，除了在原書各處進行小小的刪削和時態的改動以外，我保持了本書的原來面貌，未加觸動，此外，我以跋的形式附加了簡略的一章，使本書寫至一九四四年。這一章的新材料是根據我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在中國當戰地通訊員的工作背景下寫出來的，當時我訪問了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並且第二次到了當時已經擴大的中國共產黨人控制區去。珍珠港襲擊事件發生以後，我成了一個委任的美軍記者，我以這個資格，於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再次訪問中國，既同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了談話，也同國民黨的領導人談了話。

《西行漫記》在全世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使我感到驚奇。我曉得它並不是甚麼文學傑作，當我寫作本書的時候，我設想它在國外的讀者會比較少的。我的主要希望是，這部書對許多中國人證實是有幫助的，他們沒有機會見到自己的這些同胞，而情況的組合却給我提供了這個機會。這部書在英國和美國如此受歡迎，使我感到意外，在那裏，許多人都說這部書使他們對於中國的性格有了一個全新的概念。這大概是因爲本書面世之日，也就是中國料想不到地堅決抵抗日本從而震驚世界之時。《西行漫記》看來似乎給許多人說明了那種「現象」。

本書以各種文字翻譯出版，包括日文、印地文、蒙古文和哈薩克文。在中國，有幾種翻印本，而在數以萬冊計的中文譯本中，有一部分完全是在游擊區出版的。就我所知，寫有關

中國情況的外文書而對當前中國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當大的影響的，這部書可以說是唯一的一部。

在印度，我發現許多學生使用《西行漫記》作為思想源泉，來發動印度青年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我遇到過一位年青的德欽人，他說在緬甸，德欽人游擊隊只有這部書作為組織農村進行游擊戰的指導。一位馬來亞人告訴我，在華人領導的馬來亞游擊隊中，人們也把這部書用於同樣的目的。在俄國，我曾經同三位姑娘談過話，她們同屬於一個游擊支隊，而這個游擊支隊是由高級中學的青年學生組成的，他們在斯摩稜斯克外圍同納粹分子戰鬥。開初，他們當中誰也沒有軍事經驗，我問她們是怎樣學會作戰的。「我們從一部叫做《西行漫記》的書裏得到一些主意。」她們回答說——她們不曉得我是誰。

我不自以為我給了這部書很多諸如此類可供汲取的國際適用的經驗教訓。人們會看到，它基本上是新聞記者的作品，在許多書頁裏，我僅僅是把那些英勇的男女們所告訴我的記下來，同這些英勇的男女們生活在一起並暫時同他們等同起來，這是我的殊榮。如果我有任何個人的功勞的話，那僅僅是在於我有足夠的判斷力去讓他們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我依然認為，它是一個壯麗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續篇，現在正以中國山河間的血和淚撰寫着。

埃德加·斯諾

一九四四年五月於康涅蒂克州馬迪孫城

一九六八年版序

這部書所記述的行程和事件，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原稿則是在北京城外日本軍隊發射的一片炮聲中，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當時我在北京居住。在中國，那些七月炮聲揭開了八年中日之戰的序幕，中日之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同樣的炮聲，也預告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最後勝利，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最後勝利，深刻地改變了力量的對比，在以前所稱的「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和外部，情況都是這樣。

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這個報道同遠離西方（國家）一個地區的一支被隔離的戰鬥力量有關，時間是在最大的災難降臨西方（國家）的前夕。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國聯沒能制止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征服，因此它垮了。一九三六年，西方「同盟國」容許希特勒重佔萊因蘭。它們無能地坐視墨索里尼攫奪埃塞俄比亞。其後，它們又在中立的偽善下，禁止把武器運往西班牙，這樣就使共和國得不到進行自衛的手段，來抵抗以佛朗哥為首的反動將官，而他們是獲得數以千計進入西班牙的納粹和法西斯軍隊和飛機的公開支持的。就是這樣，西方「同盟國」鼓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形成了一個聯盟，這個聯盟表面上是針對俄國，但其意圖顯然是要征服整個西歐。一九三八年，西方「同盟國」聽任希特勒併吞奧地利。接

着，張伯倫和達拉第以捷克斯洛伐克來酬賞希特勒，作爲「我們時代的和平」的代價。不久，他們就得到了希特勒——斯大林條約的抵補。

這就是進行這次旅行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這個陷於分裂的社會的內部情況，在本書的正文裏是有所說明的。一九三六年時，我已經在中國居住了七年了，而且作爲一個外國記者，我曾經在中國作了廣泛的旅行，並學得了一些語言知識。這是我對中國所作的一篇最長的報道。如果說這篇報道享有比大多數新聞更加有效的生命的話，那是因爲它不僅不是一種不經久的新聞「特稿」，而是包容了許多有永久性的歷史的事實。此外，它之所以博得人們同情性的注意，也許是因爲它面世的時候，正是西方大國爲了私利而指望奇蹟會在中國出現的時候。它們幻想民族主義的新興起，好使得日本泥足深陷，以致它沒法轉向西方國家（在遠東）的殖民地——這是它的真正目標。《西行漫記》有助於證明這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人的確能夠提供有效地抗日所需要的民族主義領導。

其他的情況也有助於延長這部書的效用。我是在一個特別有利的時刻遇見毛澤東和其他的領導人的，那是介於兩個漫長戰鬥時期的戰鬥暫息期間。他們騰出了大量時間跟我談話，無比坦率地講了個人和非個人的情況，他們講得這麼多，非任何一位外國新聞記者所能完全吸收得了。一九三九年，我第二次去見了毛澤東以後，中國西北所有的紅軍根據地就爲國民黨的軍隊所封鎖了，而在他們的後方，在游擊區周圍，則爲日本人的佔領所截斷。其後五年，由於沒有一個外國記者能夠到達紅都延安，因此這些報道依然是唯一的資料來源。

自然，從黨人的觀點看來，這部作品裏的許多東西都是歷史，但它是像創造它的男女們那樣活着的歷史。它不僅為非中國人讀者，而且為全體中國人民（包括除了共產黨領導人本以人以外的一切人），第一次提供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可靠敘述，也是關於共產黨人進行長期鬥爭，以實現中國三千年歷史中最深刻的社會革命的第一個有聯繫的故事。在中國，本書已印行了許多版，而在數以萬冊計的中文譯本中，有一部分完全是在游擊區出版的。

我不自以為我給了這部書很多可能供汲取的國際適用的經驗教訓。在許多書頁裏，我僅僅是把那些非凡的年青男女們所告訴我的記下來，我三十歲時同這些非凡的年青男女生活在一起，並從他們那裏學到（或者說是有機會學到）許多東西，這是我的殊榮。

一九三七年，當《西行漫記》的英文版面世時，書中的大部分材料實際上沒有證明文件來源。今天，許多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由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中國學者協助或指導）已經寫出了幾十部重要性和質量各異的作品。由於有着許多可供採用的新資料，在我自己和別人的事後聰明的幫助下，本可以對本書原文進行許多改進——然而這樣一來却使本書可能具有的原來價值失去了。因此我的意圖是，除了訂正排印上的錯誤、拼法上的錯誤或事實細節上的出入以外，原文留置不動。這個希望證明不是完全實際的，且在下面談談未達目的之處。

因為《西行漫記》是在戰爭的條件下完成的，所以我沒有機會看到或改正第一版的校樣。直到現在為止的其後幾版中，我也沒能這樣做。有一類錯誤受到了掩飾：我在現場手寫的筆記，包括了許多我以前不曉得的名字，我不能常常用中文把它們記下來。把這些名字音

譯成爲英文，從韋德—賈爾斯的標準看來，終歸是拼錯了的。現在，這些已經（我希望）一律訂正過來了。

除了這類一致以外，我廣泛地把以前的現在時態動詞改爲過去時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消除許多好像是真的時代錯誤，並使得現代讀者讀本書的故事時感到更加親切。本書引用或推衍別人的證言時，通常都保持原文的字句（爲了避免瞎改既定的歷史材料），即使它同現在可取得的更加可信的消息有衝突，也是如此。隨便哪一種情況，讀者都可以參看傳記略記或本版（修訂版）的註釋，以補足或修改原文的事實或見解。在本書各處，我（懷着回顧自己的某一種可怕的感覺）改寫了一些句子，因爲時間的推移（或最初時書寫模糊），使得我對原來寫下來的難以理解起來了。本書中的極大部分，所有的事件、主要的旅行筆記、談話和傳記（包括毛澤東的傳記）依然原樣未動。

我隨意省略、壓縮或放棄了對少數不再是重要的事情冗長敘述，騰出了篇幅來容納年表、一篇跋、新的腳註，若干至今未發表的文件、每章的評註，以及若干動人的歷史經驗教訓，這些歷史經驗教訓是以傳記的形式，續寫於最初在這裏介紹的眞正非凡的人們的早年生活故事之後。爲了把新的過渡性事件組織起來，把一些段落甚至整頁刪去，是必要的。

無疑地，倘若我刪去這本書的幾章，不會損害全書（但對讀者有益）。不過，修訂是不容易的。我敢說，和本書沒有甚麼牽涉的人，他們才能夠沒有甚麼痛苦完成這項工作，並且帶給讀者更多好處。

因此，我向本書裏所記載的一切人致敬並致謝，感謝他們的幫助和允許使用他們的談話和照片，特別感謝毛澤東；感謝費正清，他不止一次地看了這些已往的足跡；感謝彼得·J·西博爾特，他比我們在三十年代寬廣得多的眼光進行了鑑定；感謝恩里卡·科洛蒂·皮斯切爾，他不辭勞苦地把它譯成意大利文，並釋到了一九六五年版，這激勵了我的努力；還有，感謝瑪麗·希思科特、特露德·沙費爾和洛伊斯·惠勒的幫助和鼓勵。

埃德加·斯諾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於日內瓦

目 錄 (上册)

| | |
|---------------|-------|
| 一九四四年版作者序 | 一 |
| 一九六八年版序 | 四 |
| 導 言 | 一 |
| 第一篇 探尋紅色中國 | 費正清博士 |
| 第一章 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 七 |
| 第二章 開往西安的慢車 | 一四 |
| 第三章 「大漢的子孫」 | 三三 |
| 第四章 通過紅色的大門 | 三三 |
| 第二篇 到紅色首都去的道路 | |
| 第一章 被白匪追逐 | 四四 |
| 第二章 造反者 | 五五 |
| 第三章 賀龍二三事 | 六六 |
| 第四章 紅色伙伴 | 六六 |

第三篇 在保安

| | |
|-------------------|----|
| 第一章 蘇維埃強人····· | 七 |
| 第二章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 七 |
| 第三章 關於對日戰爭····· | 廿 |
| 第四章 紅色劇場····· | 二六 |

第四篇 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

| | |
|-----------------|----|
| 第一章 幼年時代····· | 二九 |
| 第二章 長沙時代····· | 三三 |
| 第三章 革命的序曲····· | 四一 |
| 第四章 國民革命時期····· | 五一 |
| 第五章 蘇維埃運動····· | 五九 |
| 第六章 紅軍的成長····· | 六六 |

第五篇 長征

| | |
|------------------|-----|
| 第一章 第五次圍攻····· | 八一 |
| 第二章 一個國家的遷移····· | 八七 |
| 第三章 大渡河上的英雄····· | 九三 |
| 第四章 過大草地····· | 一〇一 |

導言

費正清博士

由於《西行漫記》一書的產生方式，因此它是一部名著。埃德加·斯諾當時才三十歲，已經以記者的身份在中國度過了七年時間。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人剛剛完成了他們從中國東南向西北的成功轉移，並開始實行他們的統一戰綫策略。他們樂意向外間世界講述他們的經歷。斯諾則有能力對此作出報道。本書的讀者今天是會知道這種因素組合的。

埃德加·斯諾一九〇五年生於堪薩斯城，他的先人曾經漸次地向西遷移，從北卡羅來納而肯塔基而進入堪薩斯地方。一九二八年，他開始環遊世界。他到達上海，當了記者，從此在十三年中就沒有離開過遠東了。在踏上了報道中國共產黨人的途程以前，他曾經走遍西北的飢荒地區，跋涉於緬甸公路上，這條公路十年後才正式通行，他報道了一九三二年不宣而戰的上海之戰，並成了《星期六晚郵報》的記者。那時候，他已經是孫夫人宋慶齡的朋友，並會見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安家以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燕京大學附近，燕京大學是在美國傳教士贊助下建立起來的主要基督教大學之一。作為朝氣蓬勃和廣泛覺醒的年青美國人，斯諾夫婦對於一九三五年年底反對日本侵略的中國學生運動，已

經有着廣泛的認識。他們曾經學習中文，發展了適度流利的口語。除了出版他記述日本侵略情況的《遠東戰綫》以外，埃德加·斯諾還編纂了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譯文集《活躍的中國》。

就是這樣，在日本向東北和華北擴張支配了報紙的頭條消息的這個時期裏，這位年青的美國人不僅報道了當時的事件，而且透過這些事件，接觸到中國愛國青年的思想感情。他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具有廣泛的人類同情心的年青人，他曉得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革命激情，並且能夠以一些中國語言的初步使用來同他們通聲氣。尤有進者，埃德加·斯諾是一個活動家，他隨時準備促進值得予以促進的事業，而不是一個全然消極被動的旁觀者。最重要的是，他證明了自己是一個熱心報道事實的記者，他能夠對當時的主要趨勢作出評價，並以鮮明的色彩，向美國的讀書界描繪這些趨勢。

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人廣泛地被稱爲「赤匪」，而當時也沒有任何一個西方觀察家同他們的領導有着直接的接觸，或向外間世界報道他們的情況。埃德加·斯諾到中國共產黨的總部去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十五年的歷史了，但是，二十年代的災難襲擊，却曾經使它處於虛弱的危險境地。

一九三六年六月，當他得到孫夫人的介紹，出發到被封鎖的西北紅區去時，他對於中國的情況和中國青年的心情思緒，很具眼識，這使得他幾乎無比地能夠理解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强大吸引力，當時這個運動依然處於發展的過程中。那時候，西安的東北軍在心理上準